

●文化透视

全球化、文化研究

和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对话

王 宁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最初出现在经济学界和国际金融界,它用来描述一种全球范围内资本的运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者自然欢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害于全球化的人则无端地抱怨全球化的无情和霸权。总之,近几年来,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引起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注意,可以说,这方面的讨论已成了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的又一个热门话题。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近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波及就是一个证明。毫无疑问,既然“全球化”现象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现象,因此它必然先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一定的后果。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大的市场机制的循环中,发展迅速者自然处于优势,而发展缓慢或原有的经济实力薄弱者自然受到波及乃至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按照西方学者的估计和测算,就全球化使大多数人、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边缘化而言,其比例是 20%:80%,也即占世界总人口的 20% 的精英分子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 80% 的人则服务于全球化的法则。这样一个比例仅仅是从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现状而得出的,若将其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恐怕比例还得缩小为 10%:90%。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若为中国近几年来经济繁荣的表象所迷惑,隐伏其中的种种内在危机若得不到适当的自我调节,很可能引发出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今天只是刚刚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中,就已经感到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两方面后果:挑战和机遇。就其挑战而言,它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不适应国际性竞争的企业边缘化,同时也使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观念老化、方法陈旧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放逐到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或者成为激烈竞争中的牺牲者。因而全球化在广大人文知识分子中受到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审慎的、辩证的甚至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也即对之既不可盲从,也应认识到其重要性,以便思考我们相应的对策。

既然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也关心全球化这个话题,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同时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就我们从文化学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全球化问题而言,我们探讨的中心主要是文化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是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而导致的一个结果,由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的界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例如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现代主义的“整体化”的变种)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全球化话语则是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近几年来在西方帝国的中心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将探讨全球化的触角推向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少学者都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视角来探

讨全球化问题,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后现代性条件时指出,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性动作无疑居首位。他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这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针对跨国资本和全球化时代的种种后现代现象提出对策。另一位西方左翼历史学家阿瑞夫·德里克则更为关注全球化问题,并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德里克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与新的传媒实践结为一体,因此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同样也是剧烈的;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切断了政治界限,因而也就切断了文化上的界限。随着资本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便是一种本土化”。这就清楚地指明了全球化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文化上的全球化和民族政治上的本土化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近几年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大概可以说明这一后果。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当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了各种形状:面对大众文学的挑战,经典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各种小报的周末版和副刊成了某种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有着更多观众的电视艺术对需要更大经济和艺术投入的电影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因而致使中国电影受到来自好莱坞(西方文化)和本土(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双重挑战;在西方社会早已不那么时髦的卡拉 OK 歌厅也开始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的领地;话语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运作制约着图书市场的生存和发展,书商的崛起更是强有力地冲击了本来就在日益萎缩的图书市场,使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商业行为特征;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复制

技术的发达甚至使以 MTV 的形式来塑造歌星和影星成为可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诚然,文化生产者在创造文化艺术产品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并认真考虑“消费者”(读者和观众)的因素以及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了,这较之过去的单一的政府干预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毕竟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消费品的生产,它虽然同样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的接受程度和生产的数量为衡量的标准。因而对文化产品的估价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方面体现在,它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这样便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而它的消极方面则表现在它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阻,因而造成了新的等级对立。当然,在当今这个充满种种偶然因素的后现代社会,精英文化艺术有时也会出现一度的繁荣和走红,但这种反弹现象并不能说明精英文化就一定会比大众文化拥有市场。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对策?这已成为我们文化研究学者关注和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学术界,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讨论“文化研究”的论文和研讨会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无疑对活跃文化学术气氛、尽可能在文化研究这个中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上实现跨文化对话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实际上是当前风行于西方文化理论界的一种具有“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思潮。本文所说的文化研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其中包括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的区域研究,此外也应加上考察影视传媒

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文化研究的特征是当代性和大众性,它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使不同的话语力量得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和沟通。就东西方文化关系而言,由于文化研究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和消解中心特征,它所主张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即不同的文化都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合理内核,在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之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动、互通和互补,而非对立和冲突。对于这一大的趋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还未能意识到,其原因主要是,针对全球化的现象,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进行着抵制和反击,这就是本土化。

当然,本土化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就全球化的美国中心意识而言,欧洲学者和政治家是极为反感的,他们多次呼吁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今年开始启动的欧元统一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政治和经济霸权的一种牵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范围的本土化倾向。对于我们从事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化倾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能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继续下去。目前,我们不安地看到,在一些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潮流作为全球化的对立物被夸大到极限:在日本这个大大西化但却仍在许多方面保留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本质的发达国家,本土化的倾向表现为对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和文化形象的树立,当然这种弘扬和树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以及日本民族的民族魂,但这种本土化情绪若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就有可能被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而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欲望的膨胀,并有可能威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在印度这个典型的“后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本土化的尝试与印度民族的非殖民化斗争密切相关,终因印度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而不太可能对周围的民族构成太大的威胁,但这几年在这个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已足以说明本土化势力的过于强大所带来的恶果,

它最近的频繁进行核实验就说明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有可能转化为向外扩张的行动。这说明,面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化策略并非上策,它有可能加剧本来就存在的区域性的冲突,进而引发东西方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对立。

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的语境下也受到强有力的抵制,这主要体现在对所谓“大中华”意识的不恰当的弘扬。同样,在一些东南亚及海外的华人区内,主张用“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来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呼声也有增无减。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一种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对立推波助澜,这其中明显地显示出弊大于利。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反对强调任何一方面,因为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进而给我们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对策应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在进入本世纪最后一年之际,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因此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文化冲突”。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决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追求和谐关系、但同时保持各自的文化身分的共存和共处的关系,这就是我对未来的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发展趋势所抱的乐观态度。